

中国特色 政党政治研究

Research on the political party poli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蔡永飞◎著

中国特色 政党政治研究

Research on the political party poli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蔡永飞◎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特色政党政治研究 / 蔡永飞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6.2

ISBN 978-7-5126-2609-6

I. ①中… II. ①蔡… III. ①政党—中国—文集
IV. ①D66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17917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70mm×240mm 1/16

印 张: 23.25

字 数: 357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2609-6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目 录

第一编 中国特色政党政治的由来和特点	1
孙中山开创中国特色政党政治的历史贡献	1
两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制度创新意义	28
国共合作建国历史机遇的错失	
——中共中央在 1946 年一二月间的“糊涂”	52
论革命党、建设党、执政党	7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以阶级斗争学说为基础的社会主义	91
中国为什么坚持民主集中制	116
执政党需要从群众党向干部党转变	127
用执政党思维看待和支持农民组织	143
发展党内民主应在县级地方率先突破	153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	162
 第二编 中国的参政党	169
中国特色的政党关系	169
参政党为什么接受共产党领导	179
参政党的政治联盟性质及其政治地位	186
参政党是执政党的亲密友党	194
参政党的进步性和广泛性	202
参政党的代表性	208
中国民主党派的转型	216
参政党的政党意识	223
参政党如何发展党内民主	229
参政党机关的专业化建设	237
参政党的运作和自身建设：以民革为例	247

执政党对于参政党建设的主导责任	283
关于多党合作制度和参政党的关键词	291
第三编 政治协商制度的运作及其改革	311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在中国协商民主中的地位	311
政协委员的选拔和履职	323
政协会议发言程序事关大局	353
专题协商会应成为政协大会讨论“一府两院”工作报告的会议形式	356
作者后记	364

第一编 中国特色政党政治的由来和特点

孙中山开创中国特色政党政治的历史贡献

2011年10月9日，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再次对孙中山先生作出高度评价：“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这一评语延续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孙中山先生的一贯好评。1956年11月12日，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中，毛泽东称孙中山先生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1996年11月12日，江泽民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孙中山先生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1997年，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

中共领导人对孙中山先生的高度评价，是基于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基于他对中国的历史贡献。孙中山的历史贡献十分突出的一个方面是他开创了中国特色政党政治。可以用四个关键词来说明孙中山政党政治思想和实践的贡献和特色：振兴中华、辛亥革命、以俄为师、国家统一。

一、振兴中华——孙中山先生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提出了现代中国政党乃至中华民族在一个多世纪中的历史任务

随着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活动的开展，“振兴中华”的口号一再为人们所重复。这一当今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口号，最早是孙中山1894年11月24日在美国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时提出的。兴中会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具有政党性质的政治组织。孙中山在《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中写道：“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为什么要“振兴中华”呢？“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

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苦厄日深，为害何极！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①建立兴中会就是要“振兴中华”，就是要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欺凌和压迫，建立一个民主的现代化国家，让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口号的本意和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生活中所采用的“振兴中华”口号的基本取向是一致的。

（一）“振兴中华”口号的风行始于20世纪80年代

但其实，“振兴中华”的提法在当时并没有列入兴中会以及后来同盟会纲领的表述之中。“兴中会盟书”是这样说的：“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国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同盟会的纲领则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后加了“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也没有用“振兴中华”的提法。这或许是因为当时所谓“振兴中华”首要在于恢复汉族人的统治，所以用“恢复中华”的提法更加明确。但由于辛亥革命一旦将满清统治者连同君主专制制度一起推翻以后，“鞑虏”就不需要“驱除”了，孙中山提出以“五族共和”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准则，国内各民族“立于平等地位”。因此，“振兴中华”的提法在此后很长时间并没有被太多使用，直到20世纪80年代，“振兴中华”才成为风行全中国乃至华人世界的口号。无疑，这时候的“振兴中华”所要“振兴”的是包括全中国各族人民在内的“大中华民族”。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81年3月20日深夜，中国男子排球队在香港参加世界杯排球赛亚洲区预赛，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比赛实况。这一场比赛中国男排打得十分艰难，头两局都输了。然而，中国男排置之死地而后生，一连扳回3局，反以3比2战胜了南朝鲜队。消息传来，同学们兴奋异常，奔走相告，大约有4000多名学生来到在楼群间的空地上欢呼雀跃，呼喊“祖国万岁！”“中国万岁！”等口号。不知道是谁，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得到了同学们的响应。又不知是谁提议：“我们游行吧！”于是，浩浩荡荡的队伍在北大校园里行走，“振兴中华”的口号一遍遍地高喊着，标有“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横幅在三角地、燕园的天空高高飘扬。

北大学生发自内心的呼喊，得到了官方的肯定。1981年3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毕靖、徐光耀采写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一文，描述了北大学生的那个激情之夜。虽然只是一篇短篇报道，却引起了强烈反响，“团

①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9页。

结起来，振兴中华”被称为“80年代的时代最强音”。为了纪念这个激动人心的夜晚，北大1980届毕业生留给母校一块纪念碑记载了这件事，这块碑至今仍树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正门左侧的草坪中。石碑的正面，是“振兴中华”四个大字，背面的碑文叙述了那个夜晚的情景：“1981年3月20日夜，中国男排在香港比赛获胜消息传来，北京大学4000多学生集队游行，高唱国歌，喊出了80年代的时代最强音‘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特建此碑，以纪念。”据报道，2006年12月4日，北京大学还专门召开“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口号提出二十五周年庆祝大会，认为北京大学学生提出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八个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传遍全国，影响了一代青年，会议号召全体同学继承和发扬北大的光荣传统，牢记“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誓言。

最重要的是，官方文件采用了“振兴中华”的提法。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名义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我们希望国民党当局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同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完成统一中国大业，实现振兴中华的宏图，为列祖列宗争光，为子孙后代造福，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谱写新的光辉篇章。”^①1981年10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采用了这个提法：“和平统一，振兴中华，千秋伟业，系乎一转念一反掌之间。让我们学习中山先生的遗训，‘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携起手来，为创造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新历史而共同奋斗。”^②由此，“振兴中华”的口号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华人中不胫而走。

（二）“振兴中华”口号的重大意义

那么，为什么孙中山于19世纪提出的口号，到了20世纪、21世纪还在被人们沿用呢？

首先，“振兴中华”是对中华民族建设现代化历史使命的高度概括，也是20世纪以后中国特色政党政治的主题。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凭借工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军事优势、以资本主义的贪婪和疯狂，强行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使中华民族面临了前所未有的亡国灭种危机，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判断最初由徐继畲提出，后经李鸿章在一个奏折中采用而广为人知），中国人民只有奋起振兴中华，实现现代化，才能彻底摆脱帝国主义侵略

① 《人民日报》，1981年10月1日。

② 《人民日报》，1981年10月10日。

压迫的悲惨命运。正如孙中山在《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开篇所说的那样：“中国积弱，至今极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国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邻，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见效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因此，“有心者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抒此时艰，奠我中夏。”^①孙中山领导兴中会、同盟会发动革命，不仅要改朝换代，而且要全方位“振兴中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不仅要求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还要求物质生产方式现代化、要求建设平等均富的文明社会。孙中山的革命和建设的理想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革命和建设的目标，至少在追求中华民族的复兴方面是一致的。所以，共产党人继续以“振兴中华”的口号来号召和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为中国现代化而奋斗。经过 100 多年的艰苦探索和奋斗，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极大成功，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现代化程度都已经极大地缩短了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距离。当然，直到今天，“振兴中华”的历史任务还没有最终完成，这一口号还将继续发挥其伟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孙中山以来的中国历史，人们应当看到，孙中山提出的“振兴中华”四个字，规定了中华民族 100 多年的历史使命，充分体现了孙中山对时代精神和民族使命的深刻把握，体现了孙中山对历史和时代的深刻洞察和卓越的政治表达能力，这是他成为中国二十世纪三大伟人之一的原因。

其次，以“振兴中华”为号召的辛亥革命在中国进行民主试验，是中国政治制度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探索。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口号的直接目的是号召革命，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推翻阻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有利于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制度。虽然辛亥革命没有建立起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稳定有序的政治制度，反而引发了长期的内战和混乱，以至于“振兴中华”这一口号所要求的现代化建设在相当长时间里未能有序开展，但从长远看，辛亥革命在思想和精神上是对饱受君主专制制度和传统政治文化戕害和束缚的中国人的解放，在政治制度建设上则是在学习借鉴西方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创立具有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制度的一次试验，无论对错都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贡献。正如 1961 年 7 月

①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19 页。

14日刘少奇在会见印度外交部秘书长拉·库·尼赫鲁的谈话中所说的：孙中山的失败“对我们很有好处。没有他的失败，我们也不能胜利。”^①195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毛泽东说：“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当然，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是一种试验，因为中华的振兴并不能以某一种制度的建立为标志，任何政治制度只应当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服务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才是最重要的。辛亥革命这一政治制度试验在今天看来并不成功，但毕竟是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第一次，它的意义不容低估。

再次，“振兴中华”口号的存续证明了两岸中国人都是孙中山未竟事业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孙中山生前就已经和其所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了紧密的国共合作关系，而且一直把孙中山看作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伟大先驱。中共中央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重新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而且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相当广泛地吸收和继承了孙中山当年提出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规划和设想。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口号和孙中山“振兴中华”的口号有所不同，但其精神实质则基本相同。而中国国民党人虽然在抗日战争之后破坏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是对孙中山联共政策的再次背叛，但毕竟在由于内战失败而迁台后始终把孙中山尊为“国父”。2011年1月1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发表新年讲话，标题是《壮大台湾，振兴中华》，不仅表明这一口号在台湾仍然得到了普遍认同，也可以看作是台湾地区领导人对大陆领导人倡用“振兴中华”的响应。事实上，最终解决那场可以追溯为辛亥革命后内战的延续的国共内战所导致的两岸分裂分治问题，已经被相当普遍地认为是完成“振兴中华”历史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可以期待，两岸同胞终将在孙中山“振兴中华”的旗帜下完成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使命。

二、辛亥革命——孙中山作为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对辛亥革命的发生和成功所起到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辛亥革命结束了君主专制制度，开启了中国政治制度现代化的历史时代，开启了中国特色政党政治的历史时代。无疑，孙中山对于辛亥革命的这一胜利所作

^① 1961年7月14日刘少奇会见印度外交部秘书长拉·库·尼赫鲁的谈话，转引自鲁振祥《孙中山·辛亥革命·三民主义：毛泽东半个世纪论说述要》，《党的文献》杂志2002第1期。

的贡献是最大的，他不仅最早提出革命的目标和任务，而且也是革命的策划者和组织领导者。尽管事实上袁世凯也对辛亥革命的成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种种历史局限，他无法超过孙中山的历史地位。

（一）袁世凯称帝之误毁其一世英名

一般来说，政治人物是不可以犯错误的，一件坏事足以一笔勾销一百件好事，而且基本上不会得到原谅。尽管袁世凯是晚清维新派的重要代表，他为中国政治、军事、司法、经济、社会管理、教育等的现代化作出了许多贡献；仅就辛亥革命而言，如果说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是其成功标志的话，那么袁世凯的功劳是谁也比不上的。但是，袁世凯称帝了，表明他的骨子里还存在着传统帝王思想，这是不可原谅的，而且由此他就被贴上了“坏人”的标签。

其实，如果说辛亥革命带来了民主的时代潮流的话，那么袁世凯所“逆”的是孙中山革命党人所倡导的民主的形式，而并没有“逆”其民主的实质。袁世凯的皇帝是“立宪皇帝”，这个“皇帝”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皇帝的含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洪宪皇帝”所受制约的程度并不亚于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军政”、“训政”，至今看来也是十分难得的。尤其是，称帝受到抵制以后，袁世凯不但认识到了错误，而且也改正了错误，主动取消了帝制。或许可以说，袁世凯最大的问题只是历史没有给他消除错误影响的时间，年仅 56 岁就死去了。作为当时唯一有能力维持社会政治稳定的领导人，假定他的生命延长 10 年、20 年，如果他能够让中国较长时期保持稳定、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进展，人们或许也就不会“计较”他犯了曾经恢复帝制的错误了。

对袁世凯和隆裕太后达成政治妥协应当正面评价。孙中山乃至后来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都是历经艰难困苦，尤其是共产党领导革命，党组织自身和支持革命的民众都付出了极大的牺牲。革命的艰难，也似乎让人们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好像没有流血牺牲，就谈不上是革命。相比之下，孙中山多次领导武装起义，屡败屡战、愈挫愈奋，那才是革命；而袁世凯掌控着强大的北洋军，一哄一骗一逼敌人就投降了，怎么看怎么像投机分子，怎么看也是欺负孤儿寡母的阴险小人。事实上，正是袁世凯从“敌人”内部响应革命，恰恰差一点让中国“革命”摆脱了改朝换代必血流成河的历史宿命。能够通过妥协实现国家政权的和平过渡、政治制度的革命性变革，这应当被看作是一种伟大的贡献，而不是没有道德的“投机”行为。另一方面，清廷愿意逊位，而不是把“天下”作为家族、家庭的私利，即使明知必败无疑也非要死磕到底、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这也是一种善于妥协的

高贵品质。后人常常以此评论清廷“气数已尽”，似乎没有人能够出头战斗到底是无能、没有血性，其实，以妥协投降既保住了皇帝家人的安全、又避免了公众无谓的流血牺牲，何尝不是一种富于智慧的政治理性呢？接受袁世凯逊位要求的隆裕太后被许多论者说成是“头脑简单”、“无知无能”，以笔者之见，即使她不是有意为之，毕竟是她作出了清帝逊位的决策，承担了丧失家族皇权的历史责任，她就是一个懂得妥协、敢作敢当的政治家，是她和袁世凯共同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次意义重大的政治妥协，这应当是辛亥革命中特别值得纪念的重要历史事件。

袁世凯承担了民主试验失败的责任。其作为辛亥革命时期掌握实权的政治领导人，未能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反而引发了战乱，也是人们否认他在辛亥革命功绩的原因。但是，把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的责任归结为袁世凯集权专制、抵制民主并不是实事求是的。事实上，深究起来，恐怕恰恰是引进西方式民主制度的革命派人士，才应当对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秩序无法稳定的状况负责。就像马克思批评的英国人把生产资料运到澳大利亚却忘记带上英国的生产关系一样，当时在中国推行议会民主制度的人们都不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事实上，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政治权力掌握在军人手中的小农社会建立分权政体，带来混乱和战争是必然的。尽管孙中山曾经把革命目的定位于建设，但不仅他自己不免有所变化，他也无法阻止别人为了权力进行不妥协的争夺。袁世凯作为当时唯一能够掌控局势的政治强人死掉了，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但袁世凯的死并不是他自己的错，倒是一个常常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某些个人身上的国家，陷入政治浪漫主义不能自拔，反而出了问题往往又把历史责任归咎于某些个人，才是十分可悲的。

另一方面，中国人民生灵涂炭、中国现代化因为战乱而滞后，这是很遗憾的事情，但看不到盲目引进西方式民主制度才是战乱的原因和历史教训所在才是更遗憾的。如果说辛亥革命的动因是原有政治制度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从而要建立一种有利于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制度的话，那么，辛亥革命后一度反而把革命的目的变成引进某种政治制度本身，或者把引进西式民主看作是天然正确、进步，这是一种本末倒置。如果剔除中途插进来的抗日战争，直到1949年内战才算基本结束；如果把海峡两岸尚未正式结束战争状态也算上的话，那么战争至今还没有结束，这就是当时辛亥革命前辈在中国试验西式民主的结果。当然，这只是历史教训。

对袁世凯的负面评价源于绝对化的思想方法。如果说袁世凯确实在相当长历史时期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的话，那么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作为袁世凯对立面的

政治力量控制了话语权。在孙中山向袁世凯移交中华民国总统权力的时候，他们还是革命的同路人，而当宋教仁被暗杀、特别是袁世凯称帝以后，袁世凯就成了革命力量的敌人，对其进行全盘否定就成为革命斗争的迫切需要。不仅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以及其后继者，而且反对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尊其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因此辛亥革命后 100 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否定袁世凯始终是正面的舆论导向。再加上袁世凯死后很快发生了“五四运动”，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①袁世凯也就成了这种“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的思想方法的受害者。最重要的是，孙中山晚年认同了“以俄为师”的道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现代化在新的政治制度的保障下取得了巨大成功，孙中山先生相当程度地保持了正统地位，这对袁世凯的历史评价无疑是利不利的。

当然，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而革命意识形态逐步有所淡化，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越来越公正客观，袁世凯的历史地位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应有的承认，包括袁世凯在内的政治人物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当然，袁世凯毕竟是在辛亥革命发生以后“参加革命”的，在整个辛亥革命中的地位，袁世凯和孙中山先生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二）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三大贡献

通常人们说到“辛亥革命”，指的是从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到 1912 年 2 月 12 日宣统皇帝溥仪下诏退位之间 4 个月的革命运动。但是，这样的界定很明显是有缺陷的。第一，把辛亥革命的起点定在武昌首义之日，排除了“驱除鞑虏”的革命目标的由来。很多学者认为，应该把孙中山于 1894 年 11 月 24 日成立兴中会看作是辛亥革命的开端，因为兴中会章程不仅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更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革命纲领（孙中山在《建国方略》第八章中说是 1885 年中法战争之后他“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但实际上 1894 年 6 月，他还在赴天津上书李鸿章，表明他当时还没有打算革命，而是在上书被拒之后才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二，到清帝退位时也可以说辛亥革命已经取得成功，革命就应该“结束”了，但孙中山说“革命尚未成功”这一点也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 6 月，第 832 页。

得到了公认，如果以孙中山这一判断来界定，应当到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之前宋教仁被刺事件为止。宋教仁被刺事件是袁世凯彻底破坏“民国”制度的标志，由此引发了“二次革命”。既然“二次革命”是“二次”革命，革命的对象也已经变了，“一次”革命当然就是辛亥革命。

很明显，从界定辛亥革命的起始时间来看，讲辛亥革命，孙中山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他不仅是革命的灵魂，而且他是革命的实际领导者。概括来说，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孙中山提出了革命理论和革命纲领，对辛亥革命实行了思想政治领导。

孙中山为辛亥革命制定了革命纲领和革命理论，他提出的“振兴中华”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和“三民主义”理论，是辛亥革命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以学者唐德刚之见，孙中山“驱除鞑虏”的口号把大清帝国之内一切罪恶，都派给鞑虏去承担，打击面缩小，抵抗力也减少。在一般人心目中，一旦鞑虏驱除，中华恢复，则其他一切枝节问题似乎均可迎刃而解。^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的确是一个极富于政治智慧的口号，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关键。

孙中山对革命思想的宣传是值得特别关注的。首先，孙中山善于通过发表演说来宣传革命思想，这是中国政治史上创新性的政治活动方式。在西方政治运作方式中，发表演说是政治人物联系群众极为重要的途径。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多在外国进行，因此他也颇为依赖演说这一方式。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曾经说过：“在历史上推动最伟大的宗教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力量，从远古时候起，一直是说话的神奇力量，而且也仅仅是说话的神奇力量。只有靠说话的力量才能打动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有伟大的运动都是人民运动，都是人类热情和感情的火山迸发，它们不是由残酷的穷困女神就是由投在群众中的语言的火把所触发的。”^②孙中山的演讲是有这样的效果的，毛泽东也曾说过：“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③学者唐德刚在他的《民国前十年》一书中特别描述了孙中山1905年8月13日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演说，称之为“孙中山第一次以现代政治家姿态向广大而热情的政治群众发表了政治讲演”。当时，他穿一身白色哔叽西服，头戴白色礼帽，风度翩翩，口若悬河，把那些留学生听得

① 参阅唐德刚《民国前十年》一书，台湾远流出版公司。

② 转引自美国威廉·夏伊勒著，董乐山等译，《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23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755页。

如痴如醉。按照唐德刚的说法，孙中山此次演讲一炮而红，此次演讲后第7天即8月20日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当选为总理，“孙文在中国革命中的不移地位，也从此确立了”。

其次是借助媒体传播革命思想。现代政治思想家、政治活动家通常都是文笔优良的政论家。孙中山在伦敦被捕出狱后马上就用英文写了一篇《伦敦蒙难记》，在英国报纸上发表，生动的描述、深刻的分析议论，引起了全世界范围的强烈反响。当然，孙中山知识丰富、思想深刻，这是孙中山演讲和写文章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许多学者认为，孙中山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具有世界眼光、能够深刻了解世界发展潮流的政治思想家，因而他的“三民主义”理论、建国方略等，都具有强大而又长远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孙中山制造革命舆论也得到了他人的帮助。帮助最大、配合最得力的是清朝政府。一个典型事例是孙中山伦敦蒙难。清政府本来是要扼杀革命者孙中山的，却通过这一事件把孙中山造就成为世界级的革命家。这件事从清政府角度看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教训。本来对方力量并不大、不值一提，但清政府偏偏要大张旗鼓地“捉”他，结果等于是帮他造势、炒作，最后竟然成为和清政府平起平坐的对手。同时，清政府内政外交越来越失败，不断地把人民一步一步推到它的对立面，支持它的人也不不断地被分化出来，革命也可以说是清政府自己制造出来的。1911年“皇族内阁”出笼，导致本来并不接受民主共和的立宪派转而支持和参与革命，部分省区的立宪派代表人物通过谏议局或劝说巡抚宣布独立，或径自宣布独立，这是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些人士参与革命，本身也是革命党影响的结果。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人士发动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人士的论战，对革命理论、革命思想的传播也起到了作用。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也得到了许多国家政府和民间的支持，包括日本、法国、苏俄等国政府给了孙中山很多帮助，虽然他们基本上是别有用心。甚至“革命”这个词还是日本人提供的。虽然古汉语早有“革命”一词，但现代意义的革命概念是从日本译过来的。1895年，孙中山在香港策划第一次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他们在当年11月10日到达神户，一上岸就看到当地日文报纸上大标题赫然写着清政府通缉“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孙中山说：好！以后我们就说革命，不再说造反。从此，中国有了“革命党”的说法。最后，孙中山亲自领导和参与革命运动，对于扩大革命影响、推动革命形势逐步成熟，本身也是极为重要的宣传，尤其是孙中山作为一个愈挫愈奋、百折不回的革命家，他的坚持本身也形成了极大影响力。

第二，孙中山建立了革命政党，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来源于孙中山的政治动

员，他也是辛亥革命的组织领导者。

在参加辛亥革命的基本队伍中，开始主要是华侨和留学生，武昌起义时则主要依靠的是由留学生领导的新军。孙中山组织革命队伍，一是亲自直接动员，二是通过革命政党来进行组织，三是通过革命思想的传播和影响力号召革命者参加革命。动员华侨参加革命，是孙中山直接动员组织革命队伍的典型事例。孙中山曾经称“华侨是革命之母”。在中华民国成立前近 20 年的革命生涯中，孙中山基本上是在与留学生和华侨相处中度过的。他曾 12 次流亡日本，43 次来往于东南亚，4 次到美国，4 次奔波于欧洲。其中，他在日本就生活了 6 年之久，把日本作为革命大本营和自己的“第二故乡”。到 1905 年同盟会成立以前，各地兴中会会员约有 300 人，其中海外华侨就占 219 人。在孙中山的动员和组织之下，华侨从经济上支援了革命。孙中山的胞兄孙眉先后资助革命的经费共约 75 万美元，以至于他后来破产，母亲去世时都无力治丧。孙中山领导的十次起义，相当多数靠的是华侨捐献。通过建立兴中会、同盟会等革命政党组织，孙中山把许多华侨和留学生拉进了革命队伍。同盟会领导的黄花岗起义是孙中山直接领导革命运动的高潮。所谓“黄花岗 72 烈士”，实际上是 86 位烈士，其中有 31 位华侨，8 位归国留学生。最有名的烈士之一是归国留日学生林觉民，他在参加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被捕，就义前给妻子陈意映写了一封十分感人的《与妻书》。按照唐德刚《民国前十年》一书看法，黄花岗牺牲的烈士每个人都是将相之才，却被当作冲锋陷阵的小卒牺牲了。一旦集体牺牲，则同盟会之精英斫丧殆尽；但是他们之死，也挖掘了我们民族的良心，清廷恶政也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参加武昌首义的革命力量不是孙中山直接组织起来的，但是在孙中山动员下参加革命的。1939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数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1919 年的五四运动，1925 年的五卅运动，1935 年的一二九运动，就是显明的例证。”^①毛泽东所说的“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追根溯源，就是从孙中山开始的，是孙中山在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中不断宣传革命，才使他们百川归海、投身革命。留学生运动最有影响的是留日学生运动。1905 年 8 月 20 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即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1906 年，中国留日学生大约 2 万人，其中湖北达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641 页。

1360人。留日学生回国以后，在国内各地发动学生、新军、会党，组织了各种革命团体。发动武昌起义的“共进会”于1907年成立于东京，其动员人是同盟会的“庶务”（相当于秘书长）刘揆一。武昌起义以后，各省军政府的都督、部长以至各级官员也有不少是留日学生。这就是虽然孙中山没有直接领导武昌起义、却能够高票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原因。

第三，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党十次发动武装起义，带来了革命大势的形成。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第八章解释武昌起义成功的原因时说：武昌起义之所以能够成功，“不在武汉之一着，而在各省之响应也。吾党之士皆能见及此，故不约而同，各自为战，不数月而十五省皆光复矣。”^①革命党在武昌首义之后分别在各地组织队伍发动了起义，这种“各省响应”的功劳当然就是孙中山的了。事实上，孙中山之所以一再举行那种规模很小、不可能达到夺取全国政权目的的起义，是因为孙中山认为，清政府对全国的统治已经十分脆弱，一个地方的小规模起义就可能成为推动大清王朝的一块多米诺骨牌。第九次起义失败后，他安慰革命同志说：“一败何足馁？吾曩昔之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之无计划、无勇气耳！”^②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说：“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③武昌起义也是其中一块多米诺骨牌。

三、以俄为师——孙中山在欧美式民主试验失败后选择走苏俄革命道路，这是他的一个重大贡献

在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之际，辛亥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要意义受到了关注。2011年4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在接受中央电视台《海峡两岸》节目采访时说：“辛亥革命我觉得从政治上来说有两个成果，一个成果就是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成果是催生了中国共产党。”这一见解是很深刻的。尽管1911年的辛亥革命本身并没有直接“催生”中国共产党，但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混乱状况、中国现代化建设对集中统一领导的迫切需要，才使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所以从中国历史发展

① 《孙中山文集》，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12月，第867页。

② 《孙中山文集》，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12月，第865页。

③ 《孙中山文集》，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12月，第865页。